

台商对祖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与成因分析

张传国*

内容提要 台商在祖国大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地域分异性。经济发展水平、现有投资规模、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活力是台商直接投资产生地域分异的关键因素,同时地缘与政策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台商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各省市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数总体上与绝对地域分异模式基本一致,但在吸收台资工作的努力程度与潜力方面还存在差异。

关键词 祖国大陆 台商直接投资 地域分异 成因

台商在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90 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台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大陆吸收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地域分异性(李非,2002),这种地域分异性是空间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体现,是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 90 年代以来台商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性,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于客观评价大陆各省市区吸收台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与潜力,进一步分析中国大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和空间转移规律,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比较合理的地区分布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①。

一 文献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般性的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鲁明泓,1999),但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大多集中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因素方面,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讯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Vernon,1996)。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

要因素,它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近年来,成本学派又获得较大发展,并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纳入分析中,Caves(1971)认为,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Tatoglu and Gaister,1998)。此外,关税、非关税壁垒、税收优惠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也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Clegg,1992)。折衷理论(Dunning,1993)对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这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的价格和质量、国际交通和通讯成本、投资优惠或障碍、商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社会基础设施、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与政治差异、R&D 和营销集中和积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等。Agodo(1978)发现地方

* 张传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361005 电话:0592-2184680 电子信箱:chuanguozhang@sohu.com。

①台湾是中国的—个省,本文所称的外商投资为:包括来自台湾投资在内的境外投资。

政府发展规划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并不是规划本身,而是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对外商有吸引力。Weis(1997)发现税率和腐败与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Leonard(1984)和 Kumar(199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愿流向环境保护标准高、污染管制严的国家。Jun 和 Singh(1996)分析了 1970—1993 年 31 个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情况,发现政治风险是决定外资流向的重要因素之一。Torrissi(1985)分析了地区整合和哥伦比亚吸引外资的关系,结果显示该变量与外资流入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问卷调查分析和区位模型分析。问卷调查方法是现代投资区位理论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魏后凯,2001)。区位模型分析中一般是运用各种数学模型,如多元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模型、数量回归模型和“逻辑”选择模型等。Hongmian(1995)利用统计模型研究了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与一些关键区位因素间的定量关系,如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工业基础等。此外,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有 Wei 和 Yinggi(1999)以及 Cheng(2000)等。这类研究并不直接探讨投资者的动机,而是认为外商的区位选择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并假设区位选择是区位特性的函数。

国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李小建(1996)对香港特区在中国内地投资区位的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许学强和李胜学(1999)对广东省利用 FDI 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贺灿飞(1997)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做了实证分析;鲁明泓(1994)用 1989 年的数据评价了中国 29 个省市区和 45 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等等。有关大陆台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部分学者也做了初步尝试,如黄德春(2002)对近年来台资北进与西移的影响因素与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李非(2003)分别从投资门槛、行政效率、政策优势、市场腹地等方面定性研究了近年来台商在福建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方宁生(2001)从 IT 产业的角

度,分析了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林其屏(2001)研究了第四波台商投资的影响因素与特点。除此以外,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有王永龙(2002)、杨建梅(2002)等等。

以上研究从理论或方法上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因素,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但是,许多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各实证研究之间很不一致。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台商在祖国大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而言,从总体上看,目前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上。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方法与实践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台商在祖国大陆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研究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性以及产生这种分异性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分析评价大陆各省市吸收台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与潜力。

二 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特征

(一)绝对地域分异模式分析

我们首先计算各省市 1990—2001 年台商对大陆累计直接投资总额,然后计算各省区市占大陆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这是从台商投资方的角度所做的分析,是地域差异的主观和绝对数量,称之为绝对地域分异模式。

从总体看,台商直接投资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表现为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梯度格局,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规律,与中国区域经济模式基本吻合。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以闽粤与苏沪浙为核心向两翼扩展的态势,两核心所占比重近 70%,江苏为 22.2%、广东为 21.5%、福建为 12.9%、上海为 7.2%、浙江为 6.4%,这些省市在地理分布上偏于中南部,与台湾省接近,同时福建、广东与台湾还存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而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台商的直接投资则相对较少。可见,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台商投资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台商直接投资的边界区位效应与距离因素都起了重要作用。

表 1 台商对祖国大陆直接投资绝对与相对地域分异模式计算值(1990—2001)

%

省区市	各省区市 比重	区位熵	省市区	各省市区 比重	区位熵	省区市	各省区市 比重	区位熵
北京	2.869	0.684	安徽	0.932	1.109	重庆	0.689	1.105
天津	3.586	0.790	福建	12.911	1.384	四川	1.118	1.299
河北	0.430	0.181	江西	1.606	1.913	贵州	0.086	0.956
山西	0.717	1.210	山东	3.586	0.597	云南	0.717	2.328
内蒙古	0.466	2.454	河南	0.861	0.631	西藏	0.007	1.868
辽宁	3.467	0.789	湖北	1.732	0.849	陕西	1.076	1.289
吉林	0.502	0.565	湖南	1.004	0.563	甘肃	0.143	1.122
黑龙江	0.710	0.620	广东	21.519	0.775	青海	0.002	0.571
上海	7.173	0.863	广西	1.793	1.067	宁夏	0.036	0.770
江苏	22.236	1.596	海南	1.435	0.981	新疆	0.143	1.999
浙江	6.444	1.917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2002年;《投资中国》2002年6月第100期;《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2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1991—2002年;<http://www.investment.gov.cn/tjsj-guobie-template.asp>。

(二)相对地域分异模式分析

绝对地域分异模式可以充分反映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空间差异与区位偏好,但不能反映台商直接投资在大陆各省市区吸引外资中的相对地位与地域差异,因此,需要从受资方(祖国大陆)角度分析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地域差异,本文用区位熵对此进行衡量。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LQ = (fdi_i / fdi) / (FDI_i / FDI) \quad (1)$$

其中 LQ 代表台商对某省市区直接投资的区位熵; fdi_i 是台商对该省市区的直接投资总额; fdi 是该省市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FDI_i 、 FDI 分别代表台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大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LQ 描述台商投资在各省市区吸引外资中的相对地位,反映其地域差异。 $LQ > 1$ 表明台商投资对于某省市区有重要意义或台商对该省市区的投资较多; $LQ < 1$ 则说明台商投资相对不重要或台商对该省市区投资较少。这是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相对衡量,因而称之为相对地域分异模式。

表 1 显示,大陆台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熵基本呈现西部与东部高于中部的分布格局,包括陕西、甘肃、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西藏、广西、内蒙古等省市区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与东部临近台湾省的部分省市的台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熵相对较高,表明这些省市区台商直接投资的地位相对重要,

而绝对地域模式中地位相对重要的江苏、广东、福建、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区位熵相对降低,其中广东省的区位熵降为 0.775。可见,尽管这些省市的台商直接投资额在台商对大陆投资总额中占有绝对份额,但是由于这些省市也是中国大陆吸收其他外资较为集中的地区,相比之下,这些省市的台商直接投资在外资中的地位显得相对不重要,而广大的西部地区是中国吸收外资最为稀少的地区(李莉,1995),因而台商直接投资就显得相对重要。

三 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一)方法论

1. 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了尽可能全面分析台商直接投资产生地域分异的原因,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差异性原则、替代性原则、可量化原则与主导性原则的指导下,从影响台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选取了 12 个因素,以这些因素的统计与实测指标构建了一套分析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产生地域分异原因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1),并以这 12 个具体指标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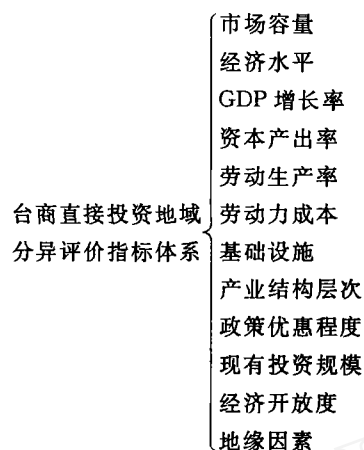


图1 评价指标

2. 指标辨识与量化应用。(1)市场容量用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能反映某地区的经济规模,是市场容量最适合的替代变量;(2)经济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有效反映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3)资本产出率用国内生产总值与总投资之比表示;(4)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分别用国内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之比和劳动报酬与从业人员之比表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表明劳动力的质量与价格;(5)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层次分别用邮电运输总产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和表示;(6)现有投资规模指各省市自治区累计台商直接投资总额;(7)经济开放度用外贸依存度表示,即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8)政策优惠程度与地缘因素不能直接度量,为了反映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分析中对其进行了量化。政策优惠程度代表一个地区在吸引台资方面自主权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程度,该变量越大,国家的政策越优惠,在吸引台资方面的优势越大,东部、中部与西部的政策优惠程度分别取3、2、1;对于地缘因素,东部与台湾地区邻近的省区为3,东部其他省区赋值2,中西部省区赋值1。

3. 确定主成分。考虑到所选取的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所选取的因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任若恩,1997),在本文中的主要影响是导致人为

强化某些因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影响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妨碍对台商直接投资地域分异成因的正确判断。为了避免这种误差,本文引入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卢纹岱,1997),它是一种常用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当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就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使这些新变量既能反映原来较多变量的信息,而变量之间又无多重共线性,综合处理后的变量称为原来变量的主成分或主因子。

首先将各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得到标准化数据:设原始数据为矩阵 $X = (x_{ij})$,经标准化变换的数据为矩阵 $Y = (y_{ij})$,其中 $i = 1, 2, 3, \dots, 31; j = 1, 2, 3, \dots, 12$ 。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估计特征值与贡献率,依据主成分累计贡献率的比例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决定主成分的个数 K ,并确定每个主因子对各解释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 w_{rj} ,其中 $r = 1, 2, 3, \dots, K$ 。

4. 计算主因子变量值。将 i 地区经过标准化后的各解释变量与其所对应的每个主因子的因子载荷系数相乘求和,可得 i 地区的每个主因子得分变量值 Z ,计算公式为:

$$Z_{rj} = \sum_{j=1}^{12} w_{rj} y_{ij} \quad (2)$$

Z 反映 i 地区分别在 r 个主因子方面吸引台商直接投资能力的差异,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产生地域分异的原因。

5. 计算综合指数。将 i 地区每个主因子变量值与所对应的特征值相乘求和,即得 i 地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数 E 。数学表达式为:

$$E_i = \sum_{r=1}^K \lambda_m Z_{ri} \quad (3)$$

其中 E 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数, λ_m 为特征值,其中 $m = 1, 2, 3, \dots, K$ 。

综合指数是对主因子的综合,它反映该地区在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综合能力的大小,是对受资方吸收台商直接投资能力的全面衡量。

6. 计算吸引偏差。根据各地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与综合指数的排序确定各地区的投资吸引偏差 D 。计算公式为:

$$D_i = F'_i - E'_i \quad (4)$$

其中 F_i 为 i 地区的投资规模的位次, E_i 为 i 地区的综合指数的位次。

综合指数是对受资方吸引台商直接投资能力的全面衡量。在统计上各地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综合指数排序应该与它们累计利用台商直接投资规模排序高度相关,但各地区的台商直接投资规模受多种因素影响,综合指数排序可能会与累计利用台商直接投资规模排序存在偏差。投资吸引偏差可用于衡量这种偏差,其经济学含义有二:一是测度该地区是否存在台商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进而可以预测其吸引台商直接投资潜力的大小;二是衡量当地政府对台招商引资方面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

(二) 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SPSS,通过主成分分析运算,得到 31 个省市 12 个解释变量的特征值与贡献率,由表 2 可知前 4 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 87%,这说明前 4 个主因子已具有 87% 的解释能力,因此我们用这 4 个主因子替代上述 12 个解释变量。

表 2 特征值及其比重

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6.169	51.410	51.410
2	2.319	19.328	70.738
3	1.206	10.049	80.788
4	0.743	6.191	86.979

表 3 是各解释变量在前 4 个主因子的载荷,为了进一步对 4 个主因子进行分析,在分析中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的方法,经过旋转后负荷系数已明显向两极分化了。第 1 主因子对经济水平、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层次、经济开放度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从不同层面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水平,可称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 2 主因子对市场容量、现有投资规模与基础设施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这 3 个解释变量对台商投资具有强烈的吸引、集聚与支持作用,可称为投资吸引因子;第 3 主因子对政策优惠程度、地缘因素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称为政策与地缘因子;第 4 主因子对 GDP 年增长率、资本

产出率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力,称为经济活力因子。

通过统计分析,结合区域经济学原理,可得如下结论:

1. 经济发展水平因子是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因素。该因子的特征值为 6.619,解释变量贡献率达 51.41%。当一个区域该因子得分较高时,表明该区域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较强。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情况如表 4 所示,得分较高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的得分分别为 0.357、0.311、0.286、0.225、0.218,得分较低省区集中在西部地区,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分别为 0.027、0.033、0.039、0.048,其他省市区的得分处于上述东部与西部省市区的得分之间,除个别省市外,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的得分情况与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绝对地域分异模式呈现较强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台商在大陆的直接投资将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的素质较高,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经济的外向程度较大,对资本有效需求的规模也较大。实际上,与外界经济联系的强度是吸引外资的前提,也是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经济外向型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台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对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中,经济水平、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层次与经济开放度的负荷系数均为正,而劳动力成本负荷系数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台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一个区域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对台商直接投资的排斥作用也在加剧。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是有限的。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市相比,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台资企业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台商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劳动力成本当然会成为台商直接投资的考虑因素,由此也可部分解释近几年来台商直接投资向祖国内陆转移的原因。

表 3

因子载荷与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因子载荷				旋转因子载荷			
	第一主因子	第二主因子	第三主因子	第四主因子	第一主因子	第二主因子	第三主因子	第四主因子
市场容量	0.757	0.477	0.239	-0.273	0.215	0.911	0.165	-0.172
经济水平	0.813	-0.425	-0.201	0.089	0.825	0.108	0.443	0.051
GDP 年增长率	-0.067	-0.559	0.732	-0.043	-0.012	0.037	-0.021	0.923
资本产出率	0.269	0.804	-0.273	-0.057	-0.148	0.472	0.080	0.738
劳动生产率	0.791	-0.483	-0.236	0.078	0.860	0.052	0.418	0.062
劳动力成本	-0.764	0.186	0.427	0.241	-0.851	-0.226	-0.119	0.265
基础设施	0.784	0.472	0.281	-0.197	0.195	0.914	0.248	-0.138
产业结构层次	0.687	-0.452	-0.082	-0.436	0.870	0.283	-0.065	0.178
政策优惠程度	0.808	0.222	-0.064	0.434	0.297	0.382	0.770	-0.258
现有投资规模	0.810	-0.353	0.103	0.136	0.231	0.775	0.345	0.048
经济开放度	0.822	0.125	0.191	0.387	0.645	0.274	0.511	0.239
地缘因素	0.760	0.263	0.351	-0.073	0.272	0.481	0.757	-0.001

表 4

各省市的主因子得分变量

省市区	经济水平	投资吸引	政策与地缘	经济活力	省市区	经济水平	投资吸引	政策与地缘	经济活力
北京	0.286	0.184	0.238	0.071	湖北	0.083	0.132	0.088	0.001
天津	0.225	0.161	0.195	0.040	湖南	0.059	0.121	0.076	-0.005
河北	0.124	0.173	0.133	-0.005	广东	0.311	0.496	0.327	0.073
山西	0.064	0.085	0.070	0.007	广西	0.054	0.115	0.098	0.003
内蒙古	0.056	0.076	0.061	0.016	海南	0.082	0.086	0.111	0.004
辽宁	0.153	0.193	0.156	0.040	重庆	0.052	0.071	0.054	0.017
吉林	0.071	0.083	0.078	0.020	四川	0.055	0.118	0.063	0.010
黑龙江	0.094	0.117	0.088	-0.001	贵州	0.027	0.050	0.039	0.019
上海	0.357	0.247	0.276	0.087	云南	0.050	0.078	0.054	0.002
江苏	0.218	0.407	0.241	0.069	西藏	0.033	0.033	0.042	0.055
浙江	0.179	0.249	0.193	0.050	陕西	0.050	0.082	0.057	0.023
安徽	0.056	0.107	0.073	0.005	甘肃	0.039	0.052	0.045	0.018
福建	0.184	0.281	0.211	0.004	青海	0.048	0.038	0.046	0.044
江西	0.054	0.100	0.073	-0.008	宁夏	0.052	0.041	0.051	0.040
山东	0.145	0.256	0.159	0.045	新疆	0.077	0.066	0.064	0.021
河南	0.062	0.151	0.081	-0.007					

2. 投资吸引因子是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该因子的特征值为 2.319, 解释变量贡献率达 19.33%。得分较高的多是人口密集、经济规模大、市场容量大、基础设施完善与现有台商投资规模较大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环渤海地区。这些地区一方面投资机会多, 投资风险低, 投资交易成本低, 容易得到利润率高的投资项目, 另一方

面对资本的有效需求大, 吸收外资规模也大, 而且还有条件获得优越于其他地区的配套投资和较好的投资环境。另外, 台湾岛内经济持续不景气, 许多面临经济转型的企业纷纷扩展岛外市场, 同文同种并加入世贸组织的祖国大陆自然成为台资企业投资的首选地区。广东、江苏、福建、浙江、上海、山东、辽宁、北京等沿海地区已成为台商投资的最

优经济区位。

此外,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集群特征(郑胜利,2002),这种集群性存在“区域性自我加速”机制,即现有台商投资对吸引台商后续投资具有重要吸引作用,导致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模式呈现一定程度的刚性。正是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使得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区域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现有台商投资的这种特殊贡献,主要在于台商投资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及信息成本的关键性制约作用。广东、江苏、福建、浙江、上海、山东、辽宁、北京等沿海地区有较长的与外商投资者接触的历史,对引进外资活动较熟悉,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小,因而这些地区也是台商直接投资密集的地区。

3. 政策与地缘因子不同程度地影响台商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该因子的特征值为 1.206,解释变量贡献率达 10.05%。该因子得分较多的地区是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市,这些区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等主要分布在这些省市。此外,这些区域有对外资非常优惠的鼓励政策和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台商投资的产业限制相对较少,可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因此,这些区域成为台商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

地缘因素对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在早期尤为重要。广东、福建与台湾地区相近,具有地缘

优势,早期台商投资也主要集中广东与福建两省。在投资初期,台商多抱着试探的态度,自然首先选择临近台湾并且多侨乡的闽粤地区。随着台资数量的增加,台商逐步冲破地缘区位的限制,尽量选择具有综合性优势的地区进行投资,并且逐步考虑产品的销售市场,因而形成了现有的台商直接投资地域分异格局。

4. 经济活力因子在吸引台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因子的特征值为 0.734,解释变量贡献率达 6.19%。上海、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是经济活力因子得分较高的省市。这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资本产出率高,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经济活力强劲的地区,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台商自然会将投资决策的砝码偏向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上述地区。

5. 各省市区的综合指数总体上与绝对地域模式基本一致。经过分析可发现(见表5):从总体上看,综合指数是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呈现为自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梯度格局,与台商直接投资的绝对地域模式相一致;在沿海地区,综合指数表现为以闽粤与苏沪浙为核心向两翼扩展的态势,广东为 3.477,上海为 3.314,江苏为 2.588,北京为 2.531,福建为 2.043,浙江为 1.928;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人口与资源大省区的综合指数比较突出,如河南、湖南、四川、新疆、黑龙江等。

表 5 各省市区的综合指数与排序

省市区	综合指数	排序	省市区	综合指数	排序	省市区	综合指数	排序
北京	2.531	4	安徽	0.680	21	重庆	0.566	25
天津	2.025	6	福建	2.043	5	四川	0.694	19
河北	1.325	10	江西	0.648	22	贵州	0.344	31
山西	0.683	20	山东	1.671	8	云南	0.555	26
内蒙古	0.608	23	河南	0.824	14	西藏	0.373	30
辽宁	1.573	9	湖北	0.926	12	陕西	0.585	24
吉林	0.736	15	湖南	0.735	16	甘肃	0.428	29
黑龙江	0.953	11	广东	3.477	1	青海	0.474	28
上海	3.134	2	广西	0.721	18	宁夏	0.504	27
江苏	2.588	3	海南	0.840	13	新疆	0.722	17
浙江	1.901	7						

(三)各省市投资吸引偏差分类与潜力评估

以 5 与 -5、2 与 -2 作为界线进行划分,可将 31 个省市分为 5 类地区:Ⅰ类为台商直接投资过度地区、Ⅱ类为台商直接投资轻微过度地区、Ⅲ类为台商直接投资适中地区、Ⅳ类为台商直接投资轻微不足地区、Ⅴ类为台商直接投资不足的地区(见表 6)。

Ⅰ类地区有江西、陕西、广西、云南、四川,这类地区的综合指数在大陆处于后列。由于该地区在对台招商引资方面的工作成效突出,因此吸收了大大超过它们应吸收的直接投资,但是该地区吸收台商直接投资的潜力和后劲将显得不足。

Ⅱ类地区包括安徽、重庆、甘肃、贵州、江苏、浙江、福建、山东。这类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综合指数偏低的地区,如安徽、重庆、甘肃、贵州,这些省市对台招商引资工作成效较为突出,吸收了超过它们应有的台商直接投资;另一部分地区是综合指数较高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它们同时也是台商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除了因为这些地区对台招商引资工作成效较为突出外,这些地区现有台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区域加速”机制作用也不可低估。

Ⅲ类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辽宁、湖南、湖北、广东与西藏,这些省区综合指数与实际吸收台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排序基本相当,吸收了应吸收的台商直接投资,为台商直接投资适中地区。

Ⅳ类地区有河南、青海、宁夏、上海,这些省市在吸收台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工作尚需努力,特别是上海,其综合指数处于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但现有投资规模远低于广东、江苏、福建,还有相当潜力。

Ⅴ类地区包括河北、黑龙江、新疆、吉林、北京,这类地区在对台招商引资工作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还需加强。伴随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北京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必将进一步增强,且潜力巨大。

表 6 各省市区的投资吸引偏差与分类

省市区	偏差	类型	省市区	偏差	类型	省市区	偏差	类型
北京	-5	V	安徽	4	Ⅱ	重庆	3	Ⅱ
天津	-1	Ⅲ	福建	2	Ⅱ	四川	5	Ⅰ
河北	-15	V	江西	10	Ⅰ	贵州	3	Ⅱ
山西	1	Ⅲ	山东	2	Ⅱ	云南	6	Ⅰ
内蒙古	-1	Ⅲ	河南	-4	Ⅳ	西藏	0	Ⅲ
辽宁	1	Ⅲ	湖北	1	Ⅲ	陕西	9	Ⅰ
吉林	-8	V	湖南	0	Ⅲ	甘肃	3	Ⅱ
黑龙江	-10	V	广东	-1	Ⅲ	青海	-3	Ⅳ
上海	-2	Ⅳ	广西	8	Ⅰ	宁夏	-2	Ⅳ
江苏	2	Ⅱ	海南	0	Ⅲ	新疆	-10	V

四 主要结论与启示

1. 90 年代以来,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由试探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投资战略由投机型、追求短期资本高回报率型转向扎根型、市场导向型投资。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以江苏与广东为核心的沿海地区,而且一直存在分散化趋势,总体上向北部和中西部转移和扩散。

2. 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异是空间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体现,是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活力是决定台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加之台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性自我积累”机制,使其地域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观。决策者对空间均衡投资不要过分强求,必须充分认识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地域分异的必然性,按照其空间转移规律指导各地区对台招商引资工作。

3. 市场容量与基础设施是决定台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启示我们,扩大市场开放度,完善市场建设,改善市场环境,同时加强交通、邮电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综合配套能力,将提升对台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4. 地缘因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台商直接投资偏好于沿海地区、与之相邻或存在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地区。政策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实施,政策因素的作用不断弱

化。

5. 各省市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指数总体上与绝对地域模式基本一致,但在对台招商引资工作的努力程度与潜力方面还存在差异。对台招商引资工作努力程度的不同是祖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地区台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方宁生(2001):《台商IT产业资本西进与两岸产业分工》,《特区经济》第12期。
- 贺灿飞(1997):《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地理科学》17(3),第193—200页。
- 黄德春(2002):《北移与西进:台资的区位比较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第7期。
- 李非(2002):《21世纪初期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走向与对策》,北京:九州出版社,第64—65页。
- 李非(2003):《两岸人世对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的影响》,《亚太经济》第1期。
- 李莉(1995):《加快中西部利用外资的若干设想》,《国际经济合作》第4期。
- 李小建(1996):《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地理学报》51(3),第213—221页。
- 林其屏(2001):《台商投资大陆的第四波及福建的对策建议》,《开放潮》第12期。
- 鲁明泓(1994):《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第2期。
- 鲁明泓(1999):《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卢纹岱(1997):《SPSS for Windows 从入门到精通》,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第444—450页。
- 任若恩(1997):《多元统计数据分析——理论、方法、实例》,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第35—38页。
- 王永龙(2002):《台商投资从集聚到集群的对策分析》,《经济问题》第9期。
- 魏后凯(200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 许学强、李胜学(1999):《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时空差异特征》,《地理学报》50(2),第26—29页。
- 杨建梅等(2002):《东莞台资IT企业集群产业结构剖析》,《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郑胜利(2002):《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集群特征分析》,《台湾研究》第2期。

Agodo, O. "The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Winter 1978, 9(3), pp. 95—107.

Caves, R. 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s*, 1971, 38:1.

Cheng, W. "What Ar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51, pp. 379—400.

Clegg, J. "Explain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 Buckley, P. J. and Casson, M. ed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Economy: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unning*, Edwardlgar, Aldershot, 1992, pp. 54—74.

Dunning, J.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ddison Wesley. New York: Publishers Ltd., 1993, p. 81.

Hongmian G. "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 1980—1989." *Urban Geography*, 1995, 16 (3), pp. 189—209.

Jun, K. W. and Singh, H.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96, 5(3), pp. 67—105.

Kumar, 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Indid*, London: Rout ledge, 1991.

Leonard, H. *A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riving US Industry Overseas?* Washington D. C.: The Conversation Foundation, 1984.

Tatoglul and Gaister, p. "An Analysis of Motives For Western FDI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8, 7 (2), pp. 203—230.

Torrissi, C.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mall LDC."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uly 1985, pp. 29—45.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80, pp. 190—207.

Wei, S. and Yingqi, Q.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 pp. 857—867.

Weis, J.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截稿:2003年4月 责任编辑:杜亚平)